

「詩性魯迅」與「政治魯迅」之間： 論黃錦樹的「南洋魯迅」重構

張 康 文^{*}

提 要

魯迅是對馬華文學影響最大的中國現代作家。1920 年代末以來，不少馬華作家以魯迅為師，不斷歌頌、學習、模仿、重寫他，形成所謂的「南洋魯迅」群體。然而，比起文學表現，「南洋魯迅」更看重魯迅的戰鬥精神。當代馬華作家、學者黃錦樹頻頻透過小說與論述回應此群體，此乃「黃錦樹與魯迅的關係研究」可以開展的面向，也是「南洋魯迅」範式轉移的表徵。為彌縫補缺，本文將討論黃錦樹為何及如何面對乃至重構「南洋魯迅」。論文結構上，本文先比較「南洋魯迅」與黃錦樹的魯迅論，凸顯黃如何以介於「詩性魯迅」和「政治魯迅」的魯迅觀挑戰、修正僅突出「政治魯迅」的前者；其次，針對黃的小說的「南洋魯迅」像，分析黃如何以問題化的視角呈顯此群體的書寫困境與負面影響，演出「狂人」正傳；最後，以黃錦樹對魯迅〈傷逝〉和〈祝福〉的「故事新編」為中心，闡釋黃如何以置入南方經驗與視角、交織美學形式與倫理承擔、汲取前作養分並化為己用的方式重寫作品，作同樣愛重寫魯迅的「南洋魯

本文於 110.12.31 收稿，111.06.17 審查通過。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DOI:10.6281/NTUCL.202206_(77).0004

迅」之示範，乃至作馬華文學擺脫（社會）現實主義傳統以及「盆栽境遇」的演示。

關鍵詞：黃錦樹、魯迅、南洋魯迅、馬華文學、盆栽境遇

Between “Poetic Lu Xun” and “Political Lu Xun”: On Ng Kim Chew’s Reconstruction of “Nanyang Lu Xun”

Chong, Kang-Wen*

Abstract

Lu Xun w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modern Chinese writers in the arena of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Many Sinophone Malaysian writers deemed Lu Xun their mentor, and have continuously praised, studied, imitated, and rewritten him since the end of the 1920s. This group of writers, who are also known as “Nanyang Lu Xun,” valued Lu Xun’s fighting spirit more than his literary expression. It is noteworthy that the Taiwan-based Sinophone Malaysian writer and literary critic Ng Kim Chew frequently responds to this group through his short stories and critiques, which is an aspect to be developed in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g and Lu Xun, and also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paradigm shift of “Nanyang Lu Xun.” In order to fill the gap, this article discusses why and how Ng Kim Chew faced and even reconstructed the “Nanyang Lu Xun.”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three main parts. First, it compares the interpretations of Lu Xun by “Nanyang Lu Xun” and Ng, highlighting how Ng challenges and revises the former, who only emphasizes the “political Lu Xun,” with his view of Lu Xun that can be described as “between ‘poetic Lu Xun’ and ‘political Lu Xun.’” Second, by analysing images of “Nanyang Lu Xun” in Ng’s short stories, this article illustrates how Ng presents the writing

* Doctoral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ilemma and negative influence of this group from a problem-oriented perspective, and creates the true story of “Mad Men.” Third, it explains how Ng rewrites Lu Xun’s “Regret for the Past” and “Blessings” by incorporating southern experiences and perspectives, interweaving aesthetics and ethics, absorbing classics and fitting them into Nanyang context. All these could be seen as Ng’s demonstration given to “Nanyang Lu Xun,” and even a demonstration on how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can break away from realism tradition and its handicapped “bonsai situation.”

Keywords: Ng Kim Chew, Lu Xun, Nanyang Lu Xun,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bonsai situation

「詩性魯迅」與「政治魯迅」之間： 論黃錦樹的「南洋魯迅」重構^{*}

張 康 文

一、前 言

2021 年 4 月 1 日，在臺馬華作家、學者黃錦樹應《聯合報》副刊「被遺忘的一本書」專題之邀，發表一篇題為〈故鄉的野草〉的小說。¹ 小說從黃錦樹與友人的真實歸鄉經驗出發，開展一則奇幻的《野草》出土故事：發現於黃錦樹柔佛居鑾老家的廁所，內容滿是魯迅作品的拼湊，作者自署「魯迅」，題簽年份「四〇」（1940 或民國 40 年）卻在魯迅逝世（1936）之後。小說最後更以新聞的形式，報導四人因發現南洋《野草》而獲「南洋魯迅文藝獎」的消息。愚人節刊登的荒誕故事當然十分吸引臺、馬學界與文壇的關注，² 然而在

* 本文初稿為高嘉謙教授「華語視界與中國文學」課程期末報告，蒙高教授悉心提點，謹此致謝。初稿曾發表於 2021 年 6 月 26 日輔仁大學中文系主辦「第二屆文華初綻——全國中文系優秀研究生論文發表會」，並有幸榮獲「優秀論文獎」，感謝鄭毓瑜教授和陳義芝教授的評論。又，承蒙兩位審查人和期刊編輯委員會提供意見，本文得以調整結構、增補疏漏，謹致謝忱。

¹ 黃錦樹：〈故鄉的野草〉，《聯合報》D3 版（2021 年 4 月 1 日）。

² 在此可作一聯想：在愚人節當天刊出此一從真實經驗出發、再加上誇張虛構的偽散文／真小說，可謂戲劇性地展演了黃錦樹對「散文不得虛構」的立場，也就是說，唯有在愚人節這容許騙人的日子方能寫虛構散文。黃錦樹對抒情散文的主體問題和文學獎散文的偽仿問題之討論見黃錦樹：〈面具的奧秘——現代抒情散文的主體問題〉，《論嘗試文》（臺北：麥田出版社，2016 年），頁 108-142；黃錦樹：〈文心凋零？——抒情散文的倫理界限〉，《論嘗試文》，頁 416-419。

捧腹大笑或嗤之以鼻之際，恐怕不多人瞭解「荒唐言」背後的「辛酸淚」、「玩笑」背後的「憂患」。³

過去，黃錦樹時被視作魯迅的知音或傳人。王德威從黃對小說倫理或「原道」的在乎將其論為「五四傳統的意外傳人」，⁴多年後更以他「厲氣鬼氣」的文筆、「喝佛罵祖」的姿態、「撻人心」（撩撥人心、召喚詩力）的發聲能量與效應稱其為「埔里的摩羅」。⁵顏健富從黃錦樹否定與解構的作品姿態，以及「反道德」的道德言行出發，將其納入「惡聲傳統」，認為黃遙呼魯迅「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摩羅之聲」。同時，顏也將黃的小說定調為「感時憂族」，亦即對魯迅等五四文人「感時憂國」精神的繼承與轉化。更有意思的是，顏還將黃的邊緣抵抗、拒絕（中國性、在地性）收編的立場與策略連結上魯迅的否定「黃金世界」、選擇「彷徨於無地」。⁶

前人已從文筆、思想、精神、戰鬥姿態等角度全面、精準地觀察黃錦樹的魯迅身影，然除此以外，關於黃錦樹與魯迅的關係研究，本文以為還可從黃的小說不時出現的「南洋魯迅」角色另闢蹊徑。本文所謂的「南洋魯迅」，指的是 1920 年代末以來，以魯迅為師，不斷歌頌、學習、模仿、重寫魯迅的馬新追隨者。此群體或南洋「魯迅熱」現象已成學術議題，有者即以「南洋魯迅」指稱之，⁷黃錦樹小說亦然，前引小說就虛設了由「南洋魯迅學會」頒發的「南

³ 黃錦樹曾篡改錢鐘書《談藝錄》序中名言以形容自己的作品：「雖玩笑之作，實憂患之書也。」見黃錦樹：〈錯位、錯別、錯體〉，《刻背（全新修訂版）》（臺北：麥田出版社，2014 年），頁 429。

⁴ 王德威：〈壞孩子黃錦樹——黃錦樹的馬華論述與敘述〉，收錄於黃錦樹：《刻背（全新修訂版）》，頁 463-464。

⁵ 王德威：〈埔里的摩羅——詩力與文心〉，收錄於黃錦樹：《論嘗試文》，頁 4-5。

⁶ 顏健富：〈惡聲與憂患——論黃錦樹的「憂族」書寫〉，收錄於張錦忠主編：《離散、本土與馬華文學論述》（高雄：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2019 年），頁 219-253。

⁷ 最初集中處理「魯迅在馬新的影響」的要屬韓山元（筆名章翰），其著有《魯迅與馬華新文藝》（新加坡：風華出版社，1977 年）。1990 年代至今，王潤華、莊華興等陸續從不同角度（後殖民、冷戰、華人史、文學史等）與材料（文學作品、評論、教科書等）探討馬華與東南亞知識界和文學界的魯迅遺產，上述研究多已收

洋魯迅文藝獎」。黃錦樹說過：

論現代中國作家對東南亞華人的影響，沒有人能超過魯迅，尤其是整個左翼。因此，思考華人問題，不可能繞過魯迅。相較於失蹤於蘇門答臘的郁達夫留給我們一個意義未明的「沒有」，被神化的魯迅自身的陰暗深刻，似乎更具思辨性、生產性，也是理解中文現代性的關鍵入口之一。⁸

「南洋魯迅」的出現正表徵了魯迅的影響，黃錦樹不但透過論述與創作積極回應此群體與現象，也不時向魯迅作品取經，生產出足以超越「南洋魯迅」的作品，形成範式轉移，惟學界還未就此展開討論。因此，本文有意彌縫補缺，探析黃錦樹為何及如何面對乃至重構「南洋魯迅」傳統。實則，這也是理解黃怎樣應對馬華文學底盤，意即（社會）現實主義⁹傳統的一個具體而微的角度——（社會）現實主義陣營多以魯迅為導師。論文結構上，本文先比較「南洋魯迅」與黃錦樹的魯迅論，凸顯前後者在文學性、社會性和思想性上的不同側重，以及黃對「南洋魯迅」的挑戰與修正；其次，針對黃的小說的「南洋魯迅」像，分析黃如何以問題化的視角呈顯此群體的書寫困境與負面影響，演出「狂人」正傳；最後，以黃錦樹對魯迅〈傷逝〉和〈祝福〉的「故事新編」為中心，闡釋黃如何以置入南方經驗與視角、交織美學形式與倫理承擔、汲取前作養分並化為己用的方式「新編」舊作，作同樣愛重寫魯迅的「南洋魯迅」之示範，乃至作馬華文學擺脫（社會）現實主義傳統以及「盆栽境遇」的演示。

錄於王潤華、潘國駒主編的《魯迅在東南亞》（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19年）。2020年，《思想》雜誌第39期就以「南洋魯迅」之名推出專號。「南洋魯迅」理應涵蓋東南亞地區的魯迅影響——《思想》專號除了涉及馬新，還有越南和印尼——但本文以馬華文學為討論對象，故將範疇框定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

⁸ 康凌、黃錦樹：〈康凌提問：馬華文學與馬共小說〉，收錄於黃錦樹：《大象死去的河邊》（臺北：麥田出版社，2021年），頁253。

⁹ 雖然社會主義文學與現實主義文學有別，但在馬華的情境，現實主義很大程度上受前者影響和制約。黃錦樹即言：「自三〇年代以來，馬華現實主義一直亦步亦趨的跟著中共的主流論述走；反映現實、為人民服務、愛國主義等教條像烏雲那樣密佈。」見黃錦樹：〈論「非詩」〉，《中山人文學報》第48期（2020年1月），頁101。

二、兩種魯迅論：「政治魯迅」與「詩性魯迅」

魯迅在馬新的影響可從 1920 年代談起，當時報刊已有零星作品討論和模仿魯迅，但聲望有限。待他於 1930 年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後，其在馬新的名聲、地位便水漲船高。1936 年 10 月 19 日，魯迅逝世，馬新一帶遂展開系列魯迅紀念活動：報刊推出魯迅紀念專號，馬華文藝界也以文字（散文、詩歌、評論）、照片、木刻悼念和致敬。¹⁰ 類似紀念幾乎每年 10 月舉辦，直至 1970 年代才逐漸消退。¹¹ 馬華文壇有不少歌頌、學習、模仿與重寫魯迅的作家，其中以（社會）現實主義作家為主。他們人數多、同質性高、影響力大，可以「南洋魯迅」統稱之。馬華文藝界的「魯迅熱」由上可見一斑。

「南洋魯迅」主要是在左翼框架中理解和接受魯迅的，他們最常突出的是魯迅的戰鬥與革命精神，以下試舉例說明：1939 年，左派報人張楚琨曾號召：「學習魯迅並不僅是學習魯迅先生的行文措詞造句，主要的是學習魯迅先生那種潑辣的英勇的戰鬥精神。」¹² 魯迅的文學性在此被置於戰鬥性之後；1950 年代，馬華文學史家方修的雜文公開支持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的魯迅論，亦即「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

¹⁰ 見章翰：〈魯迅對馬華文藝的影響〉，《魯迅與馬華新文藝》，頁 2-3、25；王潤華：〈魯迅與新馬後殖民文學〉，《華文後殖民文學：中國、東南亞的個案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 年），頁 53-55。同時，文藝界也舉辦相關紀念會、座談會、文藝晚會，甚至以魯迅之名辦圖書館、夜學、基金會，見章翰：〈魯迅對馬華文藝的影響〉，頁 10。

¹¹ 莊華興：〈六七十年代新馬華文雜誌中的魯迅〉，張鴻聲、朴宰雨編：《世界魯迅與魯迅世界——媒介翻譯與現代性書寫》（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4 年），頁 222。

¹² 張楚琨：〈〈讀了郁達夫的幾個問題〉附言〉，收錄於方修編：《馬華新文學大系（二）》（新加坡：星洲世界書局有限公司，1971 年），頁 450-451。

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並且還提到魯迅「願意在一位年輕的政治家下面當小兵」，¹³ 中國共產黨對馬華魯迅論的決定性影響由此可見；到了 1960 年代末，著有《魯迅與馬華新文藝》的韓山元（筆名章翰）仍把魯迅精神定調為「反帝反殖反封建精神」以及「硬骨頭精神，徹底革命的精神」，戰鬥性依然是論述的主旋律。¹⁴ 甚至，直至 2012 年馬來西亞南方學院召開「魯迅對新馬華人社會文化的影響」座談會時，受邀演講的現實主義作家雲里風仍然堅持「魯迅最值得我們敬仰的是他那種不畏強權和敢於反抗惡勢力的戰鬥精神」。若套用毛澤東的三「家」說，以上論述突出的是魯迅的「革命家」¹⁵ 面向，強調的是魯迅的社會性和文學的政治功能。誠如前述，以上魯迅論很大程度受中共論述所影響，但同時也不能忽略其有在地的反殖民議程與民族精神訴求。¹⁶

黃錦樹的魯迅論有別於「南洋魯迅」，惟其並沒有專論魯迅的文章，我們只能從其觸及魯迅的文論與小說窺探其魯迅觀。若說「南洋魯迅」的魯迅論以「革命家」為中心，黃錦樹的則以「文學家」為中心。討論「馬華現實主義的實踐困境」的論文中，為反駁前輩作家的寫作路線，黃搬出此群體的導師魯迅，並以其名言「所有的文學都是宣傳，但並非所有的宣傳都是文學」為例，證明魯迅為文學保留特殊地位，從而歸納道「沒有了文學性，文學不復為文學」，¹⁷ 當中

¹³ 方修：〈魯迅為什麼被稱為聖人？〉，《避席集》（新加坡：文藝出版社，1960 年），頁 77；方修：〈魯迅的文藝觀〉，《避席集》，頁 91。

¹⁴ 章翰：〈魯迅對馬華文藝的影響〉，頁 1。

¹⁵ 雲里風：〈魯迅對新馬華人社會文化的影響〉，<http://shingansk1.org.my/html/archives/790.html>。檢索日期：2022 年 6 月 29 日。

¹⁶ 魯迅在新馬發揮的反殖民力量，見章翰的《魯迅與馬華新文藝》；魯迅在新馬激發的民族精神，見莊華興：〈魯迅在冷戰前期的馬來亞與新加坡〉，《思想》第 39 期（2020 年 1 月），頁 201-217。

¹⁷ 黃錦樹：〈馬華現實主義的實踐困境——從方北方的文論及馬來亞三部曲論馬華文學的獨特性〉，《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增訂版）》（臺北：麥田出版社，2012 年），頁 99、111。

不無爭奪魯迅詮釋的意味。一篇陳映真論裏，黃錦樹稱陳早期的小說具有「真正的文學的感覺」，並判斷「最有意義的首先就是他三十歲前寫的那些陰鬱幽暗慘綠的現代主義小說」，而這種文學敏感與詩意對黃來說正是魯迅文學精神的展現。¹⁸ 黃也曾引用詩人楊澤的分析，解釋魯迅之所以沒有「意念先行」，正是因為採取了「陰冷、幽暗的透視法則」、「憂鬱的思維與凝視」——所視多為「『理性』或『真理』的強光已然消失」之處，從而生出陰冷灰暗的詩意。¹⁹ 而且，黃錦樹也指出，陳映真早期小說之所以「相仿於魯迅」，是因為它們「都不是長篇鉅製，而是中短篇，像抒情詩」，「時間歷經切割、重組、壓縮後，成了晶體」。²⁰ 這裏的「切割、重組、壓縮」可視為一道道文學製作程序，從中凸顯的是魯迅和陳映真對文學形式的重視。總結以上，黃錦樹主要是在文學性、文學形式上肯定魯迅及其傳人。他也承認，自己從他們身上受惠良多，²¹ 因此黃氏魯迅論也是其文學論的一環。

黃錦樹對魯迅文學性的強調和對「南洋魯迅」戰鬥性的批判也編織於小說敘事中。〈他說他見過魯迅〉中，拜訪過「南洋魯迅」的敘事人在夢裏遭「南洋魯迅」強暴：

那一直出現在噩夢里凌虐我的恐怖男人，那張憤怒的臉我牢牢記得，但難以啟齒。那是魯迅式的臉。²²

此情節可理解為中國文學系統（表徵為魯迅崇拜）對馬華文學的支配，敘事人

¹⁸ 黃錦樹：〈真正的文學的感覺〉，《時差的贈禮》（臺北：麥田出版社，2019年），頁128、130。

¹⁹ 黃錦樹：〈中文現代主義：理論反思與個案研究〉，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劃成果報告，計劃編號：MOST 104-2410-H-260-042，2017年，頁6。

²⁰ 黃錦樹：〈真正的文學的感覺〉，頁131。

²¹ 黃錦樹：「寫小說和散文詩的魯迅不是『左翼現實主義或革命文學』，對我而言他是個現代主義者。陳映真和郭松棻也是，從這三個現代主義者那裡我受惠甚多。」見康凌、黃錦樹：〈康凌提問：馬華文學與馬共小說〉，頁260-261。

²² 黃錦樹：〈他說他見過魯迅〉，《民國的慢船》（八打靈再也：有人出版社，2019年），頁105。

後來的病倒可謂隱喻了馬華文學的染病。²³有趣的是，敘事人後來到廟裏「收驚」，道士給她的一道符，上面竟寫有魯迅的名言「路是人走出來的」，而敘事人喝下符水後果真痊愈了。這背後有何深意？黃錦樹彷彿暗示，「南洋魯迅」之害還是要回到魯迅那裏尋得解脫之道。這一點牽涉小說的另一情節：當敘事人夢中被暴力對待時，她「一直在說著夢話，驚恐尖叫，掙扎，好像在對抗、拒絕什麼恐怖的事」，「我的夢囈里似乎有《野草》的片段」。²⁴這裏當然是在調侃雲里風的《野草》仿作《夢囈集》，²⁵但本文以為它也不無指路意義。在此可思考的是：《野草》為何可發揮「對抗」、「拒絕」「南洋魯迅」之效？它在甚麼意義上可成為武器？關乎此，先要理解黃錦樹如何看待《野草》？黃曾論道：

就台灣的散文史而言，70年代余光中曾登高一呼高倡現代散文，呼籲「降五四的半旗」、「剪掉散文的辮子」，企圖榨乾散文的水分、增加語言的密度彈性等，增強詩質，讓語言扭曲受阻，而寫下多篇代表作。楊牧的《年輪》是箇中里程碑之一。他們或許不願意承認，它們其實是魯迅《野草》的後裔。（粗體字為引者所加）

後文他也說，《野草》有「高度的文體自覺（在散文中自覺度是最高的）」、「可以自我結晶化為詩」。²⁶從以上對語言形式、詩質、文體、可以詩化等特徵的羅列可見，《野草》在黃眼裏是文學性的極致。當黃在小說中以《野草》對抗「南洋魯迅」的入侵時，他其實要提醒，文學性才是文學的前提，耕耘文學，馬華文學的路才可能走得來。

²³ 張康文：〈反思與超越「南洋魯迅」：以黃錦樹〈他說他見過魯迅〉為例〉，《學文》第18期（2020年10月），頁121。

²⁴ 黃錦樹：〈他說他見過魯迅〉，頁105、103-104。

²⁵ 雲里風的南洋《野草》仿作淡化了原作的詩意與黑暗面，並轉化成明朗的戰鬥基調。相關討論見張康文：〈會戰鬥的南洋「野草」——論雲里風的《野草》仿作〉，《漢學研究》第40卷第1期（2022年3月），頁267-299。

²⁶ 黃錦樹：〈力的散文，美的散文——散文的世界〉，《論嘗試文》，頁399-400。

然而，須指出的是，黃錦樹對文學性的強調並不意味對社會性、思想性的取消。首先，批評馬華現實主義的代表作家方北方時，黃錦樹就以魯迅為例，指出「魯迅文學的魅力所在」是「思想性和社會性必須統一在文學性裡，而在做為語言藝術的文學作品裡，三者間的關係應該是辯證的，是互補及恆處於緊張狀態的」。簡言之，黃認為魯迅的文學性具有優先性，它是文學之所以為文學、並且不可被取代的原因；社會性與思想性當然必要，但它必須「統一在文學性」，「做為語言藝術的文學作品」還是前提。其次，黃錦樹同樣肯定魯迅的思想性和社會性，舉例而言，他並不反對馬華現實主義作家對「魯迅的精神遺產」的如下認識：「做為國家機器之外的異議的存在正是文學之所以為文學在『思想性』上的特質」。有意思的是，黃還進一步以此檢視此群體，並嚴厲批評他們並未成功「反映現實」、只流於「愛國主義」的國家意識決定論，「把社會寫實主義原具有的左翼色彩和對國家機器的批判性消弭殆盡」。²⁷ 在他的詮釋下，這群號稱「魯迅子弟」的馬華作家不僅沒有魯迅的文學表現，也沒有魯迅面對現實的道德勇氣與批判能力，徹底背叛了他。第三，如同前引的方北方論，黃錦樹也注意到，魯迅的文學性、思想性和社會性是辯證、互補且處於緊張狀態的。討論現代散文的論文中，他指出魯迅曾思考「血與墨的辯證」，對文學提出倫理學上的批判。並且，他也從魯迅〈怎麼寫〉的「有破綻也不妨」、「與其防破綻，不如忘破綻」進一步延伸：「必要時——或總是如此——它必須在美學上有所缺憾，……美學的主導性必須讓位於倫理學」。²⁸ 換言之，黃錦樹雖重視文學性，並視之為文學的前提，但此前提並非牢不可破，在特定時刻，它可有所調整，文學性可暫時退至思想性、社會性之後——自然，這是出於反思性的結果，與黃所批判的「南洋魯迅」之戰鬥至上不可同日而語。

「南洋魯迅」與黃錦樹都以魯迅為師，但兩人的魯迅論大不相同。「南

²⁷ 黃錦樹：〈馬華現實主義的實踐困境——從方北方的文論及馬來亞三部曲論馬華文學的獨特性〉，《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增訂版）》，頁 111、99。

²⁸ 黃錦樹：〈論嘗試文——論現代文學系統中之現代散文〉，《論嘗試文》，頁 100-101。

洋魯迅」在左翼思潮席捲下，以及殖民者的壓迫、馬國政府的不平待遇中高歌魯迅的戰鬥性，即便談到文學也是以之為戰鬥的武器，其對魯迅社會性的強調遠超思想性、文學性，此魯迅論或可以「政治魯迅」名之。相對於此，黃錦樹認為魯迅首先是一名文學家，主張文學性面對思想性、社會性具有優先地位，並且也是馬華文學的出路，就此或可以「詩性魯迅」總結之。然而，黃的文學至上論並非鐵板一塊，他同樣看重魯迅的思想性與社會性，並以為在必要時刻，前後者可交換位置。故此，「詩性魯迅」說仍有不足，「『詩性魯迅』與『政治魯迅』之間」或更能代表這種以文學性為首，但也不忘社會性，並且兩者之間持續辯證、互補的複雜狀態——這一點也相仿於黃自身的文學定位，他曾開玩笑地自我總結為「前寫實—現代主義者」，²⁹此定位實也事關「詩性—政治性」、「美學—倫理」。如前所示，王德威與顏健富基本從黃錦樹本身的書寫實踐追蹤魯迅的身影，其中主要凸顯兩者思想與精神特質的相近，本文則從黃錦樹自身的魯迅詮釋出發，從中得出黃有意識地突出介於「『詩性魯迅』與『政治魯迅』」的魯迅／文學論。往下將分析，持有以上魯迅／文學論的黃錦樹如何在小說中書寫與他路線不同的「南洋魯迅」，以及書寫背後的意圖。

三、「狂人」正傳：黃錦樹小說的「南洋魯迅」像

不同於前人是研究梳理「南洋魯迅」的議題，黃錦樹主要是透過小說清理這段歷史的。黃有數篇小說以「南洋魯迅」為要角，為了坐實此稱號，他如此表現這些群體的魯迅崇拜：持有魯迅的各種「周邊商品」：銅像、作品人物木雕、各種版本、譯本的魯迅作品，參加魯迅研究會，演出魯迅相關的話劇，高歌〈我們是魯迅的子弟〉一曲……³⁰調侃「同鄉文人種種怪異行徑」的小說

²⁹ 黃錦樹：〈該死的現代派——告別一位朋友〉，《焚燒》（臺北：麥田出版社，2007年），頁153。

³⁰ 黃錦樹：〈他說他見過魯迅〉，頁89-109；黃錦樹：〈祝福〉，《魚》（新北：印刻出版社，2015年），頁15-39。

〈名士風流〉(2020)中，³¹作為「名士」之一的「南洋魯迅」有以下身分——「南大畢業」、³²「老左首席評論家」、「專擅的文類是雜文」。³³從中可知，左翼或社會現實主義作家是「南洋魯迅」的主要代表。一直以來，黃錦樹對馬華（社會）現實主義作家的批評可謂不遺餘力，³⁴黃無法接受他們社會性過重以致壓倒文學性的路線。因此，小說在刻畫「南洋魯迅」時常常加以戲仿、嘲諷、批判，當中最典型的即是將「南洋魯迅」設計成精神病患或「狂人」——不同於魯迅筆下那清醒的「狂人」，而是字面意義的「狂人」。他們或來自精神病院，或與紅毛丹意象同時出現，後者是馬來西亞霹靂州怡保市歷史悠久的精神病院 Ulu Kinta Mental Hospital——一般以其坐落地丹絨紅毛丹（Tanjung Rambutan）稱之——的轉喻。前文提及的「南洋魯迅文藝獎」，小說就註明「歷年的得獎者中，出身紅毛丹的不止七位」。³⁵配合這樣的角色定位，黃錦樹採用〈阿Q正傳〉「暴露國民的弱點」³⁶的書寫模式，鋪展「南洋魯迅」的病症，成就一篇篇南洋「狂人」正傳。值得注意的是，〈阿Q正傳〉正是「南洋魯迅」最為稱道的魯迅作品，馬華文學史上至少出現過七篇南洋重寫版，³⁷黃錦樹自己也留意到「南洋左翼讀者長期以來只能讀〈阿Q正傳〉」。³⁸故此，使用類〈阿Q正傳〉的模式來書寫「南洋魯迅」有意無意間發揮了「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作用。

³¹ 黃錦樹：〈尋找故居〉，<https://udn.com/news/story/12661/4737458>。檢索日期：2021年5月12日。

³² 南洋大學有不少學生深具左翼精神，南大也是馬華左翼文學的重要陣地之一。

³³ 黃錦樹：〈名士風流〉，《大象死去的河邊》，頁190。

³⁴ 代表論述見黃錦樹：〈馬華現實主義的實踐困境——從方北方的文論及馬來亞三部曲論馬華文學的獨特性〉，頁95-114。

³⁵ 黃錦樹：〈他說他見過魯迅〉，頁107；黃錦樹：〈故鄉的野草〉，《聯合報》D3版。

³⁶ 魯迅：《偽自由書·再談保留》，《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卷5，頁154。

³⁷ 南治國：〈旅行的阿Q——新馬華文文學中的阿Q形象談〉，《華文文學》第54期（2003年11月），頁42-49。

³⁸ 康凌、黃錦樹：〈康凌提問：馬華文學與馬共小說〉，頁253。

（一）「應聲蟲」症

黃錦樹筆下的「南洋魯迅」之狂表現在極度誇張的魯迅崇拜現象。他們模仿魯迅的外觀，如「蓄魯迅式的八字鬚」，或乾脆整容成魯迅的樣子。³⁹生活上，處處可見魯迅的標記，如種植野草、懸掛「咸亨酒店」的牌匾和魯迅遺照、仿造魯迅紀念館的書房。⁴⁰創作時，他們取名「正宗魯迅」，改姓「周樹人」的「周」，或採用「魯迅用過的一八一一個筆名」。⁴¹作品方面，稍有創造性的會想像魯迅「附身」，書寫「如果魯迅也經歷了這一切，他也會那樣寫」⁴²的作品；沒創造性的則抄襲、拼湊魯迅原作，像〈故鄉的野草〉發現的南洋《野草》即截取、拼湊自魯迅的〈長明燈〉、〈狂人日記〉、〈明天〉、〈藥〉、〈阿Q正傳〉等。又，待人時，有者自詡魯迅，「聽說有年青人要見魯迅，都會很親切的接待，會牽著你的手說許多勉勵的話」，⁴³或以魯迅之名贈書，如〈故鄉的野草〉中的南洋《野草》就題有「贈南洋少年國魂 魯迅 四〇、五、一 紅毛丹」。⁴⁴魯迅於1936年逝世，扉頁上標記的卻是「四〇」（1940年或民國40年）。以上種種未必符合現實的「南洋魯迅」，而是對他們的嘲弄、戲仿。從中，黃錦樹企圖警告，「南洋魯迅」對魯迅始於模仿、附庸，終於拼湊、抄襲，死於中國的魯迅不斷在南洋重生，⁴⁵馬華文學從而失卻自身的主體性。

馬華文學的誕生本和中國現代文學密切相關：南來文人由於亂離、統戰等因素而南遷，在南洋開闢文學疆土的同時，他們也將中國的知識觀念移植過來：首先是五四時期的文學啟蒙與教化的文學工具論，緊接著是經中共轉手的、工

³⁹ 黃錦樹：〈他說他見過魯迅〉，頁109；黃錦樹：〈名士風流〉，頁190-191。

⁴⁰ 黃錦樹：〈他說他見過魯迅〉，頁109；黃錦樹：〈祝福〉，頁21、24。

⁴¹ 黃錦樹：〈名士風流〉，頁191。

⁴² 黃錦樹：〈他說他見過魯迅〉，頁93。

⁴³ 同前註，頁108。

⁴⁴ 黃錦樹：〈故鄉的野草〉，《聯合報》D3版。

⁴⁵ 〈祝福〉中，「南洋魯迅」永發住的洋樓，牌坊刻有魯迅逝世的年份「1936」，從中暗示他活著魯迅的「餘生」。見黃錦樹：〈祝福〉，頁21。

具論色彩更濃厚的社會現實主義，兩者皆形塑了馬華文學的底色。馬華文壇的「魯迅熱」即是以上現象的表徵。對此，黃錦樹深感憂慮與不滿：

如果一個系統的文學長期受另一個系統支配（中國革命文學的大小論爭毫無例外在大馬重演一遍），並且以該系統的教條（不論是現實主義、地方形式，工農兵文學、還是民族形式）作為自身存在的指令，那「馬華文學主體性」真不知如何談起？⁴⁶

小說中「南洋魯迅」醜態的鋪展正是為了戳穿馬華文學「淪為大中國意識奴隸的過度中國性」的現實，黃錦樹就曾名之為「中國革命文學的應聲蟲」、「中共意識形態應聲蟲」。⁴⁷〈匪夷所思——一篇「工作報告」〉（2020）就敘及一「南洋魯迅」時常在精神病院挖土，因深信「很快就可以挖到延安了」。⁴⁸

還可注意的是，一些小說裏，「南方／南洋魯迅」甚至比「北方／中國魯迅」更維護「魯迅」傳統。與魯迅小說同名的〈祝福〉中，黃錦樹形塑一個擅寫魯迅書體的角色永發，他的魯迅體「幾可亂真」，連北京、上海魯迅紀念館和東京大學的藤井省三教授都私下下訂，以作新發現的「魯迅手稿」。⁴⁹關於此，羅鵬（Carlos Rojas）以為，「書法練習可以作為對他（永發）失去雙腿的象徵性補償，也可能更主要的是對失去與中國故土聯繫的補償。」⁵⁰然而，

⁴⁶ 黃錦樹：〈馬華左翼文學的製作〉，《注釋南方——馬華文學短論集》（八打靈再也：有人出版社，2015年），頁159。

⁴⁷ 黃錦樹：〈與駱以軍的對談〉，《土與火》（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年），頁323；黃錦樹：〈小說能做甚麼？——與王安憶對談〉，《魚》，頁311；黃錦樹：〈「馬華身後有一個民國的影子」——試論馬華文學的民國向度〉，《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學刊》第24期（2020年12月），頁6。

⁴⁸ 黃錦樹：〈匪夷所思——一篇「工作報告」〉，《大象死去的河邊》，170。

⁴⁹ 黃錦樹：〈祝福〉，頁25。

⁵⁰ （美）羅鵬（Carlos Rojas）：〈傳統與離散：從魯迅到黃錦樹〉，《傳播研究與實踐》第9卷第2期（2019年7月），頁109；（美）羅鵬（Carlos Rojas）：〈南下：東南亞家園與離散敘事〉，《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19年第2期，頁43；Carlos Rojas, "A Surplus of Fish: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Ecologies in Ng Kim Chew's Fiction," (魚之餘：黃錦樹小說中的語言、文學和文化生態)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aiwan Studies*, 4(2021), p.135.

永發應該生於南洋，而非中國——當然這並不妨礙其中國原鄉情結。康凌則認為，「假如魯迅『真跡』竟是馬來進口產品，那麼一切堅固的東西，都已煙消雲散。……不再據有權威位置」。⁵¹但，馬來亞來的魯迅「真跡」是否只是虛構，背後是否無所本？有別於羅鵬和康凌，本文以為若考慮「南洋魯迅」的指涉，此情節還可解讀成南洋魯迅崇拜現象的難以撼動、「趕超」中國。如前所示，馬華文壇的「魯迅熱」很大程度上是中國革命文學的遺產，作家對魯迅作為文學家、革命家、思想家的強調，對其戰鬥性、黨派性的凸顯，實為毛澤東「魯迅論」的「翻版」。然而，自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批評魯迅式雜文將威脅中共內部後，官方開始防範魯迅的影響，同期及其後的馬華文壇卻持續高舉魯迅，勢力毫不減弱。⁵²故而，永發的模仿魯迅體可謂「南洋魯迅」傳統的隱喻：從最初的取之中國，到後來的超越中國。作為旁證，還可注意〈祝福〉中永發作品署上的「胡馬」，以及他對中國南來的姪女小南的稱呼「巢南」，這裏即化用《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的「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來諷刺「胡馬」一直在「依北風」。如前所析，黃錦樹極為重視文學性和社會性，魯迅／中國文學至上在他看來只會成為馬華文學的負擔，即便學得再像，終究與自己的歷史與在地經驗無涉，難以耕耘出自己的文學風格。馬華文壇無須受其所累，應開出屬於自己的獨創面貌。

（二）「殺草劑」症

小說中的「南洋魯迅」之狂也展露於破壞性與殺傷力上。馬華文學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以雜文為主導文類，此文類也是魯迅在南洋的遺產。「南洋魯迅」之所以看重雜文，是因它能迅速回應現實、攻擊對手，適合政治動蕩、社會不安、左右對立的時代。⁵³小說〈他說他見過魯迅〉就敘及：「那代人喜歡

⁵¹ 康凌：〈無國籍者的文學，或南方的左翼——論黃錦樹晚近短篇〉，《南方文壇》2020年第5期，頁34。

⁵² 張康文：〈會戰鬥的南洋「野草」——論雲里風的《野草》仿作〉，頁276-277。

⁵³ 黃錦樹：〈小說能做甚麼？——與王安憶對談〉，頁311；張錦忠：〈朋友與雜文〉，收錄於黃錦樹：《注釋南方——馬華文學短論集》，頁8-9。

用許多『用過即棄』的筆名寫雜文，彼此文筆、風格相似，用的典故、比喻也大致相似」、「愛用不同筆名寫雜文損人」，⁵⁴ 文壇的戰火硝煙於焉可想。雜文不僅用於批評社會現實，還取代文學批評，〈名士風流〉中的「南洋魯迅」紅吱吱（ang-ki-ki）因而被刻畫為愛罵人、咬人、揍人，「因為他不常刷牙，被咬者常嚴重感染，有幾個態度囂張的現代派年輕人就因此淪為殘障人士，從此如果還想寫詩就只能用左手」，⁵⁵ 當中足見此群體的黨同伐異對文壇幼苗的殘害、對美學路線的窄化。藉由小說，「南洋魯迅」被具象化成文壇的絆腳石，有害於理性、健康、多元路線的文學環境之建立以及文壇新人的栽培。

「南洋魯迅」的問題還表現在對文學性的典當。「南洋魯迅」看重文學的社會功能，以文學為改變現實的武器。小說常幫此群體代言其寫作原則：「堅持革命現實主義，以為文學就該反映現實，文藝理應大眾化，雜文就該是匕首，該一刀見血」，高呼「文學的革命性，和革命的文學性」。⁵⁶ 其文學作品或批評常被黃錦樹稱為文學的「殺草劑」，⁵⁷ 因為當文學成為政治工具，審美不是被忽視，即是被排斥。這方面的不滿也化為小說意象，尤其是以「屎」與「廁所」表徵馬華文學性的破產。例：〈匪夷所思——一篇「工作報告」〉的「南洋魯迅」以糞便寫出〈狂人日記〉。⁵⁸ 〈故鄉的野草〉在廁所發現南洋版《野草》，而在此之前敘事人已提示「廁所裡能發現的，多半不過是廁紙」，南洋《野草》的價值可見一斑。〈他說他見過魯迅〉中，「南洋魯迅」周君的住處有一條通往「占蠻」（馬來語，Jamban，茅廁）之路，而這「占蠻」外表似「一

⁵⁴ 黃錦樹：〈他說他見過魯迅〉，頁 92、107。

⁵⁵ 黃錦樹：〈名士風流〉，頁 190。

⁵⁶ 同前註；黃錦樹：〈他說他見過魯迅〉，頁 99。

⁵⁷ 黃錦樹曾言：「以雜文形式出現的文學批評，就像殺草劑」、「那種殺草劑似的雜文，不止給文學帶來傷害，也給文學批評帶來毀滅性的打擊」。見黃錦樹：〈小說能做甚麼？——與王安憶對談〉，頁 311；黃錦樹：〈甲午歲末小雜感〉，《時差的贈禮》，頁 264。

⁵⁸ 黃錦樹：〈匪夷所思——一篇「工作報告」〉，頁 168。

間小小的土地公廟」，「守護者這幾戶沒往來人家的共同秘密」，⁵⁹ 這種「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描述反映黃錦樹對「南洋魯迅」的判斷：看似神勇，實無文學生產性，黃將他們拉下神台的意圖不言而喻。〈祝福〉的魯迅體專家永發也在作品上自署「冀翁」，此名靈感或來自魯迅的別名「迅翁」，其中「冀」作為渣滓，已暗示其仿作缺乏藝術價值。有趣的是，「冀翁」也是中國書法名家鄧散木的名號，之所以有此名號，一種說法是「憤」諧音「冀」，背後可見鄧對國民黨白色恐怖的憤怒。⁶⁰ 當黃錦樹為永發取名「冀翁」，或也意味單靠憤怒只能生產三流作品，⁶¹ 這亦即魯迅強調的，「感情正烈的時候，不宜作詩，否則鋒芒太露，能將『詩美』殺掉」⁶²——「憤翁」終將成為「冀翁」。另外，黃錦樹也以「非文學作品」表現文學的破產，如〈他說他見過魯迅〉的魯迅人物雕像、〈祝福〉的書法。這些作品不具美感，前者「刀工拙劣，線條生硬，摸起來毛毛札札的，年輪扭曲混亂，似乎很彷徨」，後者「筆端多飛白，毛扎扎的，看了令人心悶，但看來每一筆都費盡了心力」。⁶³ 「費盡了心力」卻依然表現不佳正是黃錦樹對馬華（社會）現實主義作品的判斷，並且，這種「非文學作品」的設置也暗指馬華作品只是「非文學」、「非詩」。⁶⁴ 黃曾分析道，馬華文化活動常常是「讓文字缺席的」，如華樂、相聲、國畫、民歌、舞獅、舞龍燈，即便是書法、春聯，其「文字的功能不過是符咒」。⁶⁵ 換言之，它無法經營文字本身，沒有文字的藝術（如文學）。

⁵⁹ 黃錦樹：〈他說他見過魯迅〉，頁 92。

⁶⁰ 金永獎：〈「冀翁」辨析〉，《浙江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S1 期（1987 年 12 月），頁 35-37。

⁶¹ 張康文：〈反思與超越「南洋魯迅」：以黃錦樹〈他說他見過魯迅〉為例〉，頁 121、124。

⁶² 魯迅，《兩地書·三二》，《魯迅全集》，卷 11，頁 99。

⁶³ 黃錦樹：〈他說他見過魯迅〉，頁 97；黃錦樹：〈祝福〉，頁 23。

⁶⁴ 黃錦樹：〈論「非詩」〉，頁 97-111。

⁶⁵ 黃錦樹：〈中國性與表演性：論馬華文學與文化的限度〉，《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增訂版）》，頁 69。

總的來說，黃錦樹小說藉由出格的言行，紅毛丹、糞便等意象，以及「暴露國民的弱點」的敘事模式，讓一個個「南洋魯迅」以跳樑小丑之姿粉墨登場，鋪演其「應聲蟲」症和「殺草劑」症，演出一齣齣「狂人」正傳。論者或會質疑，面對兇猛對手，黃錦樹有時也跟對手一樣戾氣滿盈，雜文筆法也已滲入小說之中——對付「怪物」，自己就要變成「怪物」嗎？參考上一節總結的「『詩性魯迅』與『政治魯迅』之間」的魯迅／文學論，可設想黃會如此回應：對於作為馬華社會文化重要一環的馬華文學，其缺失必須嚴陣以待，部分時刻可「忘破綻」，讓社會性偶爾逾越詩性。又，夾敘夾議且議論中帶有情緒性表述也是黃逼迫文壇正視問題的策略，類似策略也可見於其文論，他曾表明那是「不僅想解釋世界，更企圖改變世界」的他「必要的策略」，⁶⁶ 林建國也曾補充道：「如果用語上不讓情緒介入，不挑起激烈的回應，他的議題無論有多大的開創性，必定無疾而終。」⁶⁷ 面對「經典缺席」⁶⁸ 的馬華文壇，黃錦樹主張文學「燒芭」，認為「總要把舊有的枯枝敗葉、老藤野草燒盡，重理故土，才能重新播種」。⁶⁹ 〈故鄉的野草〉中，我們因而看到如下文學願景：

「拈蠻」竟然倒了，像被大象踩扁那樣，擠成了一團。……「沒關係，沒人動它過不了多久它自己也會被白蟻蛀空被風吹倒」。⁷⁰

這種想像馬華的「非文學」將如同廁所般崩塌的背後，反映的是典範轉移的期待：「對過去的對象的意識形態的批判正是為了開展我輩當下的歷史性，而把

⁶⁶ 林春美：〈當文學碰上道德：夜訪林建國、黃錦樹〉，《蕉風》第482期（1998年1月），頁9-10。

⁶⁷ 同前註，頁11。

⁶⁸ 馬華文學與「經典缺席」的相關論爭見張永修、張光達、林春美主編：《辣味馬華文學——90年代馬華文學爭論性課題文選》（吉隆坡：雪蘭莪中華大會堂、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2002年），頁105-162。

⁶⁹ 黃錦樹：〈非寫不可的理由〉，《烏暗暝》（臺北：麥田出版社，2017年），頁457。《烏暗暝》初版為1997年九歌版，本文所用乃2017年的麥田出版社新版，新版也收有1994年《夢與豬與黎明》的小說。

⁷⁰ 黃錦樹：〈故鄉的野草〉，《聯合報》D3版。

屬於歷史的還回給歷史」。⁷¹ 然，歷史能否開展，又取決於「故」事是否充分「新」編，於是，破壞之後，就是建設的問題。

四、故事「新」編：論黃錦樹〈傷逝〉、〈祝福〉

馬華文學遺產對黃錦樹並無繼承意義，它有「名」無「實」，只等待被填補、超越。由於意識到「終結『醞釀期』」的「擔子便落在我們這一輩身上了」，他呼籲「『重寫』馬華文學」，讓「父親死亡後的文學——父親缺席的文學」從此有了「父親」。⁷² 在此之中，重寫「南洋魯迅」最愛重寫的魯迅有其意義，如此方更具宣戰和示範意味。他自己就曾表白「舊題重寫」的理由：「前輩對這些題材都寫得十分粗率，往往草草了事，或語焉不詳」，因此「必須對它清點，並且寫得比他們更好」。⁷³ 弑／「示」父顯然是重寫的用意之一，並且掌握此用意將有助於解析小說的特定情節與隱喻。另一方面，魯迅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和馬華文學之「父」本亦值得後來者不斷回顧與對話，他是理解（馬華文學也在內的）中文現代文學所無法繞開的大山。於是，我們便看到黃錦樹對魯迅〈傷逝〉⁷⁴（1991）、〈祝福〉⁷⁵（2014）的重寫。

⁷¹ 黃錦樹：〈馬華現實主義的實踐困境——從方北方的文論及馬來亞三部曲論馬華文學的獨特性〉，頁 96。

⁷² 黃錦樹：〈馬華文學「經典缺席」〉，《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增訂版）》，頁 360；黃錦樹：〈非寫不可的理由〉，頁 463；黃錦樹：〈互文，亡父，走根——對談賀淑芳、言叔夏〉，《魚》，頁 332。

⁷³ 黃錦樹：〈非寫不可的理由〉，頁 462；黃錦樹：〈墳與路——重審開端，重返「為什麼馬華文學」〉，《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臺北：麥田出版社，2015 年），頁 93。

⁷⁴ 黃錦樹：〈傷逝〉，《烏暗暝》，頁 161-175。

⁷⁵ 黃錦樹：〈祝福〉，頁 15-39。

（一）置換經驗，展演南方

小說〈他說他見過魯迅〉曾虛構「南洋魯迅」和真實魯迅的一次相遇，當中，真魯迅就贈予假魯迅一本《故事新編》。這樣的設計有何用意？《故事新編》何以可成魯迅的贈禮？對於「故事新編」，黃錦樹自己又有何看法？我們可從近年他寫給大陸年輕作者的一封信中找到線索。信中，黃將「故事新編」分類，其中「接近魯迅式的故事新編」，是「借歷史背景和歷史人物來生產故事」，「歷史背景純粹只是故事的背景，人物只是傀儡，作者任意編織情節。但至少，背景或人物是可以指認的。」⁷⁶從中可見，「新」編比「故」事重要，「故事」純粹只是背景、傀儡，「新編」者的任務是在此「故」事下「任意編織情節」。但，此「編織」真的是「任意」的嗎？早年的訪談中，黃錦樹明白表示，他的作品「往往是『展示』他人的小說」，並加上自己的「引伸、補充、躡改、虛擬的引文；而在裂縫中，置入自身的經驗」⁷⁷——這不妨視作對「新編」的補充。那麼，〈傷逝〉、〈祝福〉的重寫中，黃錦樹如何將故事「新」編，「任意編織情節」、「置入自身的經驗」，以免患上「南洋魯迅」的「應聲蟲」症？

黃錦樹的〈傷逝〉是對魯迅〈傷逝〉的續寫。魯迅原作以涓生為敘事人，敘述其與子君從相戀、同居、分手到子君抑鬱而終的故事；黃錦樹接續原作，以「我」為新敘事人，補充子君不為人知的故事，並道出涓生的餘生。當中，黃採用後設形式，將敘事分成三層：一、交代「我」與「大姐姐」子君的童年過往，以及子君的死因（自盡）和生前慘狀；二、敘述子君死後的涓生生活（鬱鬱寡歡並投入小說創作，最後同樣步入死亡）；三、揭示「我」乃致死涓生的嫌犯，而第一、第二層敘事是「我」提供警方的口供。

⁷⁶ 黃錦樹：〈致李唐：人很難超脫自身存在的深井〉，《青年文學》2020年第6期，頁115。

⁷⁷ 黃錦鳳：〈異鄉的內在流離者：訪問黃錦樹學長〉，《大馬青年》第10期（1995年1月），頁6。

關於黃錦樹的〈傷逝〉，前人研究常語焉不詳、一筆帶過，要不然就只是觀察到「南洋風味的潮濕、欲望化與惡心佐料」，並批評黃錦樹「並未真正理解魯迅的《傷逝》，或者至少是表面的理解」。⁷⁸ 他們似未留意，黃的〈傷逝〉在接續魯迅故事的同時還置入其對自身所處的文學環境之思考。黃的〈傷逝〉中，涓生時而為老左（可見於他邊燃燒左手指，邊道出「燃燒自己，照亮別人」的行徑，及其對魯迅作品的抄襲），時而為無法操控語言、反被語言操控的書寫者（一直擔憂作品在「寫完後還一直不斷的在生長、繁衍、增值」，而自己「完全無能為力」，「找不到一個最終的形式、結構來裝載它、限制它」）——這裏幾乎完全疊合黃早年對馬華作家夏紹華和黎紫書新詩的批評。⁷⁹ 關於此，小說一開始響起的貝多芬〈給愛麗絲〉及涓生坦誠的「生殖功能自然退化」問題意有所指，前者作為臺灣的垃圾車音樂已暗示涓生作品的低水平，後者的無生產性也是其作品的隱喻。另外，前述論者觀察到的「南洋風味的潮濕」也非異域風情的展現，而是凸顯作為問題作家的涓生之腐爛與死亡。其中，涓生的斷手情節須結合黃對馬華文學的判斷來理解。黃曾指出，敵意環境下的馬華文化生產成了一種族裔身分抗爭的場域，它表徵拒絕向異文化同化的精神，在此之中，文學創作變成一種以「肉身和精神深刻的介入」的「社會象徵行為」，其存在本身已難能可貴，質量則往往難以兼顧。因而，寫作「裸露為一種寄生物長蛀於書寫者握筆的手，它不是藝術化，而是肉體化」，「意識的困境物質化為手的困境」。⁸⁰ 涓生的斷手因而透露黃的期許：不能停留在「握筆的手比

⁷⁸ 朱崇科：〈爭奪魯迅與黃錦樹「南洋」虛構的弔詭〉，《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01期（2015年10月），頁10。

⁷⁹ 黃錦樹：「不斷增殖、自我複製的局部彷彿無意構成一個整體；語詞似乎擁有它們自己的意志，它們唯一的欲望是繁殖，無限的繁殖。意義、理性、主體的意志都休假去了。」見黃錦樹：〈兩窗之間〉，收錄於張永修、張光達、林春美主編：《辣味馬華文學——90年代馬華文學爭論性課題文選》，頁313。

⁸⁰ 黃錦樹：〈書寫困難：困難意識／困難的書寫〉，《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增訂版）》，頁386-387；黃錦樹：〈反思「南洋論述」——華馬文學、複系統與人類學視域〉，《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頁63。

筆下的文還重要」的階段，必須與此類寫作決裂與告別。黃錦樹這種以馬華文學問題為題材的選擇不同於過往作家，它似乎也是一種提醒：所謂「經驗」，不應只是馬華現實主義反復強調的「此時此地的現實」，個人所處的書寫環境與歷史也在其中，值得認真回顧、審視和展望，如此能對寫作有更多反省和自覺。

若黃錦樹〈傷逝〉是對原作的續寫，〈祝福〉則是對原作的改寫。這篇獲頒九歌出版社「103 年度小說獎」的作品中，黃保留題名，但置換背景，一開始即「逆寫魯迅〈故鄉〉」⁸¹——因此可謂是對魯迅歸鄉系列小說的重寫——將魯迅深冬下的陰晦故鄉改為南方「赤道邊上熱帶的故鄉」。在新背景下，黃以新人物開展南洋版〈祝福〉：敘事人小南帶著父親再發「一半的骨灰」⁸²回到他的故鄉馬來西亞，途中通過小南的所見所思，讀者漸可拼出兩個革命青年的故事。再發和永發是馬來亞共產黨的成員，從名字遙呼〈魚骸〉（1995）的馬共長兄先發可知，這是另兩類革命失敗的馬共成員故事：再發被遣送中國，留下女友小蘭及其腹中骨肉小紅；永發則失去雙腳，留在故鄉照顧小蘭、小紅。小說主要敘述兩人餘生的無所作為——再發一生在被懷疑和整肅中度過；⁸³永

⁸¹ 黃錦樹：〈會意：隱喻與轉喻的兩極〉，《中山人文學報》第 45 期（2018 年 7 月），頁 37。

⁸² 這種歸鄉方式不得不讓人聯想到馬共的最後一任總書記、長年居於泰國南部的陳平。陳平 2013 年 9 月 16 日（恰是馬來西亞成立 50 週年）逝世後即謠傳其骨灰將運回出生地馬來西亞，但直至 2019 年此事才順利完成，寫於陳平去世不久的〈祝福〉（2013 年 11 月 19 日初稿，2014 年 2 月 15 日修畢）反而比現實更快將骨灰偷渡回馬。此篇小說和陳平的關係可見於黃錦樹這番話：「陳平逝世不久，大馬有朋友原擬募一個『如何讓陳平屍體返鄉』的小說集，但我其實對陳平的興趣不大（最近還是寫了篇『讓（流亡他鄉的老左）屍體返鄉』的〈祝福〉）。」見黃錦樹：〈沒有查禁？（我那既被禁又沒被禁的新小說集）〉，《注釋南方——馬華文學短論集》，頁 153。

⁸³ 因此，羅鵬所言的「在〈祝福〉故事中被『遣返』的阿發，受到中國大陸政府對華僑優待政策的支持」恐怕有所誤會。羅文另一誤是「馬來亞聯邦取代了馬來亞聯盟，並於 1958 年獲得獨立」——實為 1957 年。見（美）羅鵬（Carlos Rojas）：〈傳統與離散：從魯迅到黃錦樹〉，頁 115、108；（美）羅鵬（Carlos Rojas）：〈南下：東南亞家園與離散敘事〉，頁 46。

發只能做「山寨魯迅」，售賣魯迅體、經營「咸亨酒店」維生——表現馬共、歸僑乃至整體馬華族群的歷史命運。魯迅〈祝福〉呈顯「在故鄉，然而已沒有家」⁸⁴的疏離感，黃錦樹承繼這個主題，並更進一步，延伸成連故鄉資格都失卻的存在境況。

黃錦樹的經驗置入在社會性與思想性上都著力超越前人，並且有意從南方的視角為中文寫作提供不同的聲音。黃錦樹不滿足於前輩經營的本土化或馬華文學主體性，認為他們僅圍繞「在地認同、本地風光，沒有更多的東西」。⁸⁵他也進一步批評，他們空有「反映現實」的口號，卻不敢面對政治禁忌，不願實踐道德勇氣。⁸⁶用他的話表述，這些作品「以總體的貧乏來表徵現實的不可碰觸及不敢碰觸」。⁸⁷相對的，掌握更多文化資本且身處台灣、無政治審查之憂的黃錦樹得以深入、直接地探勘政治、族群等「存在」議題。黃錦樹對馬共此政治敏感群體所展開的系列書寫即是明證，而馬共在他筆下也是馬華族群及馬華文學的轉喻。⁸⁸對於海外華人的處境，他的形容是「存在的位置已被歷史設定」，「去到任何地方都會遇到民族主義，外來的標誌永遠鮮明」，因而他們只能「默守著房客倫理的意識，到居住在借來的地方，甚至時間也是借來的——移動的中途站」。⁸⁹〈祝福〉就藉馬共道出馬華族群乃至馬華文學的命運：面臨種種社會文化機制的的不平等，在國內外均是不被承認的「外來者」。對黃錦樹而言，馬華的「沒有」在文學中卻可能是一種「有」，甚至是一種贈予，一種「祝福」，他曾說道：「一生下來就不是『內』的」的海外身分是「全

⁸⁴ 魯迅：《彷徨·祝福》，《魯迅全集》，卷2，頁5。

⁸⁵ 黃錦樹：〈「馬華身後有一個民國的影子」——試論馬華文學的民國向度〉，頁7。

⁸⁶ 黃錦樹：〈馬華文學的悲哀〉，《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增訂版）》，頁363。

⁸⁷ 黃錦樹：〈中國性與表演性：論馬華文學與文化的限度〉，頁79。

⁸⁸ 黃錦樹嘗言，馬共的命運既是「民族國家裡某種類型的華人的集體命運」，亦是「馬華文學本身的一則盆栽境遇的寓言」。見黃錦樹：〈寫在家國之外——對談黎紫書〉，《魚》，頁318；黃錦樹：〈衣以風，飲以雨——馬華文學與馬共小說〉，《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頁353。

⁸⁹ 黃錦鳳：〈異鄉的內在流離者：訪問黃錦樹學長〉，頁4；黃錦樹：〈沒有家園〉，《焚燒》，頁118。

新的歷史經驗和書寫的空間」，「在多重、差異文化構成的間隙中，也許可以建構出一種異於往昔的主體性」。而且，黃錦樹也相信「邊緣身分可以讓人活得更警覺、更具反思性」。⁹⁰ 因此，黃不願意停留在故事背景的「南洋化」，更要以南方的立場、邊緣的身分提供不同以往的視角。關於此，〈祝福〉就呈顯兩大突破：藉南洋之子再發的「流落唐山」、思念南洋——女兒小南／巢南的取名也源於此——表示南洋可作家園、中國可作離散空間，⁹¹ 扭轉「中國」——「海外」的「內」——「外」位置或「根」——「葉」論述；二、透過再發和永發「裏外不是人」的困境，戳破「花果飄零」即能「靈根自植」或「落葉」即能「歸根」／「生根」的幻像。如同當年魯迅以中國的欠缺為改造和書寫的動力，黃錦樹亦以馬華歷史的漏洞為其作品的操演場域，⁹² 以上對書寫史、華族史的漏洞修補即是明例。並且，黃不停留在經驗置入，還試圖從南方的位置發聲，挑戰以往的種種秩序和表述。

（二）追求謊言，編織真理

黃錦樹不但批評「南洋魯迅」沒有習得魯迅的社會性和思想性特質，更不能接受其棄文學性如敝履的「殺草劑」症。誠如前述，他認為魯迅的成功在於「思想性和社會性必須統一在文學性裡」，那麼他自己是否及如何在重寫魯迅時實踐這一點？「詩性魯迅」與「政治魯迅」之間如何統一？黃錦樹過去有一論文集名為《謊言或真理的技藝》，此名背後文學論其實和上述魯迅論相近，即都關切「寫作的倫理與美學意義」。⁹³ 書中批評張大春的小說時，他也亮出

⁹⁰ 黃錦鳳：〈異鄉的內在流離者：訪問黃錦樹學長〉，頁 8；黃錦樹：〈錯位、錯別、錯體〉，頁 426。

⁹¹ （美）羅鵬（Carlos Rojas）：〈傳統與離散：從魯迅到黃錦樹〉，頁 107。

⁹² 黃錦樹：「寫作對我而言不免是遺骸沉船廢墟的考古學，以『歷史有很多漏洞』（吳濁流語）中的漏洞為操作場域，……。」見黃錦樹：〈與駱以軍的對談〉，頁 323。

⁹³ 黃錦樹：〈引言〉，《謊言或真理的技藝：當代中文小說論集》（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 年），頁 12。

其文學底牌：「小說的天職」在於「真誠的撒謊」，此觀點取自秘魯小說大家巴爾加斯·略薩的〈謊言中的真實〉：「小說是在撒謊（它只能如此）；……小說在撒謊的同時卻道出某種引人注目的真情。」⁹⁴簡言之，黃錦樹的理想文學兼具美學與倫理、形式與主題，且前後者密切結合、相互補充——因而，比起「編織謊言，追求真理」，本節更願意表述為「追求謊言，編織真理」，以突出前後者的交織，以下將說明黃錦樹在這方面的實踐。

黃錦樹「故事新編」的用意之一即是「示」父，在此之中，以「父」之「罪」為「新編」的主題更能彰顯此訴求。為了更好地反思馬華作家的書寫問題，〈傷逝〉在形式上別有用心，採用了後設形式與不可靠的敘事者。原作中，涓生是敘事人，子君藉其之口出現於小說中；來到黃錦樹筆下，涓生則淪為原作中的子君，成為新敘事人「我」敘述的對象。由於故事都是由「我」敘述的，讀者實可懷疑所述的一切：「我」有可能就是殺死涓生的真兇，通篇敘事也可視為他為脫罪而虛構的言辭——尤其考慮到他似乎刻意突出子君的可愛、可憐以及涓生的抑鬱而終，以召喚警察對前者的同情、對後者的厭惡，以及增強情節的合理性。但真相為何無人知曉，這也非黃錦樹的重點，其施力點在於展示一個比涓生更有敘述能力、並將之操控於言辭的敘事者：「我」完全把握涓生「說話時的語調、一些想像、比喻和他當下的微妙直覺雜揉成的一種敘述氛圍」，⁹⁵也成功撒謊，讓涓生以為子君已原諒他。面對警方的指控，「我」自信滿滿，反指出對方的種種推論漏洞。當中，他也嘲弄把「蠟燭」當作「陽具的象征」的新批評家——這裏顯然影射前臺大外文系教授顏元叔，顏被理論捆綁的情況可謂與馬華作家分享相似的意識困境。黃成功塑造一個既理性、節制，又細膩、敏感，能讓主體意志和語言意志持續交戰、處於「兩窗之間」⁹⁶的優秀敘事者，從而突出象徵馬華作家、僅會複製魯迅的涓生之種種不足。過去，黃錦

⁹⁴ 黃錦樹：〈謊言的技術與真理的技藝——書寫張大春之書寫〉，同前註，頁 217-218。

⁹⁵ 黃錦樹：〈傷逝〉，頁 162。

⁹⁶ 黃錦樹：〈兩窗之間〉，頁 309-313。

樹曾批評臺灣作家如張大春等人的後設形式，認為其後設「當做是一個技術化了的，人人可以做襲的『形式』，而非一種更為深刻的、富哲學及心理意涵的『狀態』。」⁹⁷簡言之，黃認為張的小說空有形式，「原道」缺席。相對於此，黃確保後設和不可靠敘事並非為炫技用，而是為了扣合作者的寫作倫理訴求：透過此形式，他塑造一敘事能手，極盡虛構、嘲謔之能事，反襯出馬華作家的表現不佳、任人魚肉，佔據權威位置的馬華（社會）現實主義在此被狠狠玩弄。後設常常事關「寫作的寫作」，以後設探究寫作問題是黃錦樹確保形式與主題達致統一的表現。

相比於〈傷逝〉，黃錦樹〈祝福〉的亮點則在意象形塑，尤其是「腳」及其表徵的馬共和馬華族群的命運。以永發為例，曾有「老高」綽號、「長得比一般人高」的他在革命戰爭中失去雙腳，此設計除了彰顯戰爭的殘酷，也隱喻馬共在馬來（西）亞的難以立「足」、無處落「腳」——現實中，不是被逮捕並遣送中國（如再發），便是退到森林乃至國土邊界；官方歷史敘事中，不是被遮蔽，便是成了國家的敵人。至於再發，遣送中國的他面臨批鬥，以致「走路時一腳高一腳低」，從中表現歸僑在大陸的舉步艱難。再發的餘生寄情於龜甲，以甲骨文銘刻自己的離散經驗，真正做到刻「骨」銘「心」。他曾將甲骨文的「祝福」（𠄎𠄎）刻成簡化版（𠄎𠄎），並將之聯繫上自己無路可走、無枝可依的身世：「拐杖𠄎（示）省略掉了：只剩下一個向天祝禱的人……那是個多孤獨的人啊，無依無靠的跪在祖國的大地上，張開大口朝著老天。」在「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震天呼聲中，作為外來者的歸僑卻只能一直跪下去。

再發的龜甲作品的腳印（𠄎）簽署更是精巧的設計。小說寫道，再發在不同作品署上的腳印「或正、或反、或向左、或向右、或向上、或向下」（見圖1）。羅鵬把再發的腳印理解成「從南洋到中國」或「從中國到南洋」的軌跡，並借用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的概念提出，這條「路徑」（routes）

⁹⁷ 黃錦鳳：〈異鄉的內在流離者：訪問黃錦樹學長〉，頁5；完整論述見黃錦樹：〈謊言的技術與真理的技藝——書寫張大春之書寫〉，頁205-239。

終會成「根莖」（roots），或曰「離散的空間」終會成「道路」。⁹⁸ 這個解釋也許和史書美主張的「反離散」、「離散有其終時」相去不遠。本文的疑惑是，如果「離散空間」指的是大陸，歸僑再發看不到出路，遑論「生根」；如果「離散空間」指的是南洋，再發無鄉可返，永發也無「足」可立，這種情況「路」在何方，「根」如何生？相反，本文認為，再發的腳印呈顯的是在中國「彷徨於無地」（魯迅語）的境遇——不僅彷徨，還找不到位置彷徨。換言之，黃錦樹不是要表現「反離散」，而是「永恆離散」、「被離散」。關於此，小說也曾透過小蘭說不完的那句「世間本來就沒有路，但人走多了就——」加強效果，這個改自魯迅〈故鄉〉的句子（「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⁹⁹）之未完成狀態，也呼應了小說一開始引述的卡夫卡名言——「我們稱之為路的，其實不過是彷徨。」以及多年前黃自己說過的：「人走多了也不過是多些骯髒的腳印而已，並不一定就是路。」¹⁰⁰ 總之，黃錦樹將「腳」的意象佈滿全篇小說，並以斷裂、消失、彷徨的狀態，有效地再現了其眼中馬共和馬華族群的「沒有位置的位置」。¹⁰¹ 馬華的書寫和存在困境探勘事關作家

⁹⁸ 羅鵬：「用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的話來說，黃錦樹的故事表明，隨著時間的推移，空曠的空間可能發展成為道路，而路徑（routes）最終可能發展成為新的根莖（roots）。……即使已有的道路可遵循，然而在這些道路形成之前，只有一個彷徨的空間。換言之，這種彷徨就是離散的空間，在那裡，離散者時常發現自己被兩股相對的（真實的或渴望的）依附之情牽絆：一邊是缺席的故土，一邊是在場的本地。」本文的商榷見正文。又，林建國多年前提出馬華文學「斷奶論」（意即放棄中國情結的沉溺）時說過，「就算一時找不到其他出路，馬華文學界至少也該有找不到出路的自覺，因為到最後只有自覺才是真正的出路。」這番話也許更能說明那彷徨腳印可能蘊含的積極意義。見（美）羅鵬（Carlos Rojas）：〈傳統與離散：從魯迅到黃錦樹〉，頁 117；（美）羅鵬（Carlos Rojas）：〈南下：東南亞家園與離散敘事〉，頁 49；林建國：〈再見，中國——「斷奶」的理由再議〉，收錄於張永修、張光達、林春美主編：《辣味馬華文學——90 年代馬華文學爭論性課題文選》，頁 378。

⁹⁹ 魯迅：《吶喊·故鄉》，《魯迅全集》，卷 1，頁 510。

¹⁰⁰ 黃錦樹：〈錯位，錯別，錯體〉，頁 428。

¹⁰¹ 黃錦樹：〈沒有位置的位置〉，《雨》（臺北：寶瓶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6 年），頁 266-268。

的寫作倫理，惟黃錦樹的論述和寫作都強調要將任何倫理關切予以適當、有效的語言和敘事形式，以「追求謊言」來「編織真理」，畢竟「謊言的技術即是真理的技藝」。¹⁰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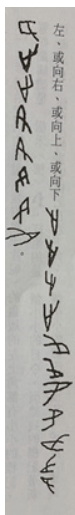


圖 1 ¹⁰³

（三）擺脫盆栽，延伸走根

「故事新編」、「舊題重寫」本是具有文學史意義的形式，它涉及傳統與現代、「故」與「新」的關係，〈傷逝〉、〈祝福〉的重寫也應放在這一點加以闡釋。而且，這兩篇小說也頻頻「『展示』他人」作品，並有所「引伸、補充、躡改、虛擬」，具高度的互文性。本文以為，這也是黃錦樹突破馬華文學「盆栽境遇」的一種方式。「盆栽境遇」是黃指稱馬華文學的外部與內部困境的用語，它涉及「國家政治的高度壓制、語言的弱勢及其策略性的輸誠（如馬華本土論者）」，其結果是馬華文學只能「小規模的發展，不健全的生長並死

¹⁰² 黃錦樹：〈謊言的技術與真理的技藝——書寫張大春之書寫〉，頁 217。

¹⁰³ 黃錦樹：〈祝福〉，頁 34。

亡」，「宛如幼樹被連根刨起，移植成為『盆栽』」。104 此外，上文的「小規模」也可用以形容與中國／港台文學比較下的馬華文學之質與量。外部環境難以解決，但文學內部是否仍有可為？書寫本身是否能一定程度解決馬華文學「小規模」的問題？指出「盆栽境遇」的黃錦樹自己如此嘗試：積極、有意識地和中文／華文／世界文學勾連、對話，從中汲取養分，化為己用，在眾聲喧嘩中發出一己聲音，「故事新編」、互文的用意即來源於此。黃曾以自己種植的金盃藤隱喻其文學：「它的根從大盆底下排水洞鑽出，從其他花盆下的洞鑽了進去，深深的固著在他盆的土裡。……它不是輸送，而是吸取。」105 這種「走根」戰略即是其文學戰略。故而，要瞭解黃錦樹的作品示範，除了觀察他如何置入己身經驗與視角、編織形式與主題，還需一探其「走根」如何延伸，與寫作史進行勾連與對話。

為何黃錦樹選擇重寫魯迅的〈傷逝〉？黃如何認識原作，又從原作吸收甚麼精華，再納為己用？首先，黃的作品採用的「不可靠敘事」或啟發自魯迅原作。魯迅〈傷逝〉有個副標題：「涓生的手記」，當中已提示通篇小說的敘述是由涓生完成的。既然子君及其一言一行都在涓生的書寫中面世，讀者看到的就非完整、真實的子君，而是涓生視角的「子君」，因而有理由懷疑所述的一切。同理可推，當黃錦樹〈傷逝〉從「我」的角度對涓生展開敘述，這一切同樣疑點重重，在此之中，帶有馬華作家影子的涓生彷彿成了牽線木偶，長期把持馬華文壇的現實主義傳統終於為人所把持。其次，黃錦樹提示原作的「故事新編」性質，進而暗示馬華作家與其的距離。關於這點，可留意黃在小說末尾透過副刊編輯所寫的「編按」，當中對涓生和魯迅的〈傷逝〉有下述說明：

104 言叔夏：〈書人物——黃錦樹修補一條叫歷史的破船〉，<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30914000698-260116?chdtv>。檢索日期：2022年6月30日；另見黃錦樹：〈Negaraku——旅臺與馬共〉，《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頁282-288。

105 黃錦樹：〈互文，亡父，走根——對談賀淑芳、言叔夏〉，頁334-335。

所附之〈傷逝〉與魯迅的同名作品一模一樣，疑為抄襲，茲不錄。又，魯迅的〈傷逝〉和日本作家鈴木三重吉的《金魚》頗有雷同之處，有興趣的讀者無妨參照比對。¹⁰⁶

鈴木三重吉的〈金魚〉是關於一對情侶的家庭小說，其中的角色塑造、以情侶生活為中心的情節（包括女主的死亡）、事後追憶式的寫作皆可見於魯迅的〈傷逝〉。然，魯迅的〈傷逝〉即便和〈金魚〉的「頗有雷同之處」，其「新編」成分還是非常顯著，特別是置入五四新女性／主體、戀愛自由、「希望」和「絕望」、「真實」與「虛構」等時代議題的討論與反思。魯迅打開書寫風景的方式符合黃所謂的「背景或人物是可以指認的」和「置入自身的經驗」，換言之，它也是「故事新編」。相反的，與魯迅〈傷逝〉「一模一樣」、沒有成功「置入自身的經驗」的涓生作品則被視為「抄襲」，並且不被錄用。經由比較和投籃舉動，黃對比出馬華作家與其導師的差距，這群魯迅學徒顯然沒有習得真傳。黃的重寫發現也繼承了魯迅在敘事策略上的巧思，同時又結合自身關懷有所開拓。

黃錦樹〈祝福〉並未如〈傷逝〉般對原作有直接而緊密的聯結與延展，其操作主要是和古今文本、作家的互文。除了前文提及的《古詩十九首》，其實小說還有陳映真、¹⁰⁷ 朱家姐妹與胡蘭成¹⁰⁸ 等的身影。然而，眾多文本中，

¹⁰⁶ 黃錦樹：〈傷逝〉，頁 175。

¹⁰⁷ 故事中，為了回報取代再發位置、照顧小蘭母女倆的永發，小蘭十分配合性慾旺盛的他。小說如此描述小蘭滿足永發性慾後的情況：「回來後伊細細的喘了好久好久的氣，好像走了好遠的山路。」這裏對話的是陳映真的〈山路〉，一篇關於獻身革命的女子之小說——〈祝福〉中的小蘭是另一種「獻身」。

¹⁰⁸ 關於此，可留意小說中完成父親夢想的兩個女兒：小紅成功尋得父親下落；小南實現父親的歸鄉之夢。父親和女兒角色或投射黃錦樹多年前的研究對象：胡蘭成及其「女兒」朱天文、朱天心，黃認為，「胡其實是被這兩個女兒（朱天文、朱天心）用語言『重新生出來』的，方有後來的影響力。那是女兒的能力」。——另一例子是王嘯平和王安憶。在他的詮釋下，「女兒是未來」，〈祝福〉的女兒觀點「可以讓那樣的敘事帶點神話意味，也利於抒情」。見黃錦樹：〈互文，亡父，走根——對談賀淑芳、言叔夏〉，頁 333

占最大比重和意義的當屬魯迅的〈孔乙己〉。再發的流離失所、不合時宜，永發的失去雙腳、複製舊作在在呼應失去歸屬、打折了腿、滿口陳腔濫調的孔乙己，小說中永發確也在書法作品自署「孔乙己」。這種連結有意顯示，這些人物皆處於社會的尷尬位置：脫節、剩餘、「沒有位置」。值得注意的是，對孔乙己的化用不僅僅是和魯迅對話，當中還有郭松棻和陳映真的作品影子。郭的小說〈雪盲〉即多處引用〈孔乙己〉，從臺灣流亡並困於美國的主人公就自比甚至認同於孔乙己的廢人形象。¹⁰⁹如前所述，黃極為重視魯迅的憂鬱詩學，他也認為，陳、郭的小說看得到魯迅「幽暗的火」：頻頻憂鬱地回返歷史現場、揭開過往傷口、書寫憂鬱的「廢人」，¹¹⁰黃因此總結道「魯迅在台灣還活著，憂鬱的活著」。¹¹¹當自承「我的寫作也是源於絕望」¹¹²的黃錦樹在〈祝福〉繼續操用「孔乙己」符號，將南洋「廢人」加入「孔乙己」集散地，他可謂把馬華文學嫁接進憂鬱詩學的脈絡，汲取詩意、變為「憂鬱的結晶」¹¹³之餘，也豐富了受創的亞洲心靈史。¹¹⁴

小說中，由再發的腳印簽名「Ψ」組成的圖像也值得一探（見圖1）。「Ψ」是甲骨文的「止」字，藉著「或正、或反、或向左、或向右、或向上、或向下」的排列，黃呈顯一種且行且停的畫面，極容易讓人聯想到他在學術界的戰場之一：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¹¹⁵「抒情傳統」論題的奠基人陳世

¹⁰⁹ 黃錦樹：〈窗、框與他方——論郭松棻的域外寫作〉，《論嘗試文》，頁241。

¹¹⁰ 黃錦樹：〈遊魂：亡兄、孤兒、廢人〉，《文與魂與體：論現代中國性》（臺北：麥田出版社，2006年），頁337、340。

¹¹¹ 黃錦樹：〈中文現代主義：理論反思與個案研究〉，頁7。

¹¹² 康凌、黃錦樹：〈康凌提問：馬華文學與馬共小說〉，頁251。

¹¹³ 黃錦樹：〈真正的文學的感覺〉，頁131。

¹¹⁴ 就此而言，黃錦樹可謂以臺灣的魯迅傳統對抗以中共魯迅論為主導的「南洋魯迅」。「魯迅」意外成了馬、中、臺三地的交戰「現場」。

¹¹⁵ 黃錦樹曾討論「抒情傳統」與現代性的關係，並將之視為學界的「傳統之發明」。另外，黃也曾從抒情傳統討論現代散文的主體問題。見黃錦樹：〈抒情傳統與現代性——傳統之發明，或創造性的轉化〉，《論嘗試文》，頁47-86；黃錦樹：〈面具的奧秘——現代抒情散文的主體問題〉，頁108-142。

驤在〈尋繹中國文學批評的起源〉指出，「詩」的字根「𠂔」蘊含「足」、「之」（走動）、「止」（停止）三義，而「足」「代表詩歌韻律、調整詩歌節奏」，陳從而將詩的觀念溯源至舞蹈藝術——「其特徵便是時斷時續的足之停、足之動」。¹¹⁶ 陳世驤從「足」出發，表明詩的本源乃一節奏藝術；來到黃錦樹筆下，「足」或再發的彷徨腳印則用以表徵馬華族群和馬華文學的「止」於困境卻又不斷上下左右求索。兩者的連結有何效果？我們彷彿再次聽到黃錦樹的文學論宣示：馬華的歷史漏洞正是馬華文學詩意／詩性的可能生發之處。然，事情並沒那麼簡單，黃錦樹對再發的甲骨作品也帶有否定之意，他自己在一篇論文就明示：「那些腳印不成字，不成詞，更不成篇。那樣的刻字當然不是『寫作』」。¹¹⁷ 實則，藉由再發的以甲骨刻下毛澤東詩句和魯迅作品篇名，黃連結了馬華文學兩種沉迷於中國性的個案：「舊／文化中國」的「骸骨迷戀」以及「新中國」的「應聲蟲」，而這兩者都是黃多年來「清算」的對象。黃錦樹曾言：「在中國性與華人的歷史實在之間，我主張尋求一個『在之間』（in-between，或譯『中間人』）的辯證空間，撕開一個距離，闢出一個空間。」¹¹⁸ 以上操作即是在納入新舊中國性的同時，又將之擺於被審視、反思、批判的位置上。整體而言，黃錦樹小說頻頻和原作與古今文本對話，從中或學藝，或聯盟，或過招，彷彿將馬華文學從盆栽移植到中文寫作的園圃，再透過走根吸取養分，開出足以爭奇鬥艷的花。

¹¹⁶ 見陳世驤：〈尋繹中國文學批評的起源〉，陳世驤著、張暉編：《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陳世驤古典文學論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頁16-18。

¹¹⁷ 黃錦樹：〈會意：隱喻與轉喻的兩極〉，頁37。

¹¹⁸ 黃錦樹：〈中國性，或存在的歷史具體性？——回應《窗外的他者》〉，張永修、張光達、林春美主編：《辣味馬華文學——90年代馬華文學爭論性課題文選》，頁321。

五、結 語

魯迅是對馬華文學影響最大的中國現代作家。長久以來，馬華文壇的魯迅傳人對魯迅戰鬥精神的重視超越其文學表現，稱許、模仿的文類也以雜文為主。面對「南洋魯迅」，黃錦樹不但「欲除之而後快」，而且深信「彼可取而代之」。首先，黃在魯迅詮釋上質疑「南洋魯迅」，強調魯迅作為文學家的定位，並以介於「詩性魯迅」與「政治魯迅」的魯迅論修正僅突出「政治魯迅」的前輩論述；其次，黃在小說中問題化此群體，凸顯其聽命於中國文壇的「應聲蟲」症和棄文學性於不顧的「殺草劑」症，並將之喻為狂人，為他們寫就一篇篇「狂人」正傳；最後，面對極愛重寫魯迅的「南洋魯迅」，黃也獻出其魯迅重寫〈傷逝〉與〈祝福〉，從中完成「南洋魯迅」的未竟之業：置入南方經驗與視角、交織美學形式與倫理承擔、汲取前作養分並化為己用——後者也是他嘗試突破馬華文學「盆栽境遇」的實踐：與古今文本積極對話，從中發出一己之聲，把「馬華文學」的餅做大。

黃錦樹的文學立場和好惡分明的態度已註定他難以肯定「南洋魯迅」重視人道、關懷政治的一面，也無法對其政治、社會與文化等結構性困境有更多耐心。並且，關於後者，還要考慮黃開始介入文壇的 1990 年代已與 1950 年代 -1960 年代的「魯迅熱」有一段時差，對黃來說，困境作為作品不佳的理由「有其終時」。面對長久不衰且阻礙精品生產與積累的「南洋魯迅」傳統或馬華（社會）現實主義，他不能「坐而言」，必須「起而行」，其文學論述與創作的原初動力很大程度即源於此匱乏。如果魯迅是扛住中國那「黑暗的閘門」，黃錦樹則是承擔馬華文學那「沉重的沒有」。¹¹⁹

¹¹⁹ 黃錦樹：「馬華文學什麼積累都沒有，就只有冒著煙的廢墟——我們必須繼承那沉重的沒有，那欠缺。」見黃錦樹：〈沉重的沒有〉，《火笑了》（臺北：麥田出版社，2015 年），頁 190。

最後，回到文中一開始的〈故鄉的野草〉，小說把馬華文學的境遇形容為茅坑，其中：

長滿了枯黃但強韌的野草，還雜了棵處境艱難的小樹，好像是棵誤落屎缸的橡膠樹，對屁股不太友善就是。¹²⁰

原為渣滓的糞便在此化為肥料，滋養文學的野草以及那棵「處境艱難的小樹」。這棵「誤落屎缸」又對拉屎的屁股帶有攻擊性的小樹除了叫「橡膠樹」，或還有一個名字，他的名字就是「黃錦樹」。

（責任校對：王誠御）

引用書目

近人論著

方 修：《避席集》，新加坡：文藝出版社，1960 年。

方 修編：《馬華新文學大系（二）》，新加坡：星洲世界書局有限公司，1971 年。

王潤華：《華文後殖民文學：中國、東南亞的個案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 年。

王潤華、潘國駒主編：《魯迅在東南亞》，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19 年。

朱崇科：〈爭奪魯迅與黃錦樹「南洋」虛構的弔詭〉，《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01 期（2015 年 10 月）。

言叔夏：〈書人物——黃錦樹修補一條叫歷史的破船〉，<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30914000698-260116?chdtv>。檢索日期：2022 年 6 月 30 日。

¹²⁰ 黃錦樹：〈故鄉的野草〉，《聯合報》D3 版。

- 林春美：〈當文學碰上道德：夜訪林建國、黃錦樹〉，《蕉風》第482期（1998年1月）。
- 金永獎：〈「冀翁」辨析〉，《浙江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S1期（1987年12月）。
- 南治國：〈旅行的阿Q——新馬華文文學中的阿Q形象談〉，《華文文學》第54期（2003年11月）。
- 康 凌：〈無國籍者的文學，或南方的左翼——論黃錦樹晚近短篇〉，《南方文壇》2020年第5期。
- * 張永修、張光達、林春美主編：《辣味馬華文學——90年代馬華文學爭論性課題文選》，吉隆坡：雪蘭莪中華大會堂、馬來西亞留臺校友會聯合總會，2002年。
- 張康文：〈「馬華魯迅」與「東亞魯迅」：對話的可能與不可能〉，《思想》第39期（2020年1月）。
- 張康文：〈反思與超越「南洋魯迅」：以黃錦樹〈他說他見過魯迅〉為例〉，《學文》第18期（2020年10月）。
- * 張康文：〈會戰鬥的南洋「野草」——論雲里風的《野草》仿作〉，《漢學研究》第40卷第1期（2022年3月）。
- * 張錦忠主編：《離散、本土與馬華文學論述》，高雄：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2019年。
- 張鴻聲、朴宰雨編：《世界魯迅與魯迅世界——媒介翻譯與現代性書寫》，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4年。
- 章 翰：《魯迅與馬華新文藝》，新加坡：風華出版社，1977年。
- 莊華興：〈魯迅在冷戰前期的馬來亞與新加坡〉，《思想》第39期（2020年1月）。
- 陳世驥著、張暉編：《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陳世驥古典文學論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
- 雲里風：〈魯迅對新馬華人社會文化的影響〉，<http://shingansk1.org.my/>

html/archives/790.html。檢索日期：2022年6月29日。

- * 黃錦鳳：〈異鄉的內在流離者：訪問黃錦樹學長〉，《大馬青年》第10期（1995年1月）。
- * 黃錦樹：《謊言或真理的技藝：當代中文小說論集》，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年。
- 黃錦樹：《土與火》，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年。
- 黃錦樹：《文與魂與體：論現代中國性》，臺北：麥田出版社，2006年。
- 黃錦樹：《焚燒》，臺北：麥田出版社，2007年。
- * 黃錦樹：《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增訂版）》，臺北：麥田出版社，2012年。
- 黃錦樹：《刻背（全新修訂版）》，臺北：麥田出版社，2014年。
- * 黃錦樹：《魚》，新北：印刻出版社，2015年。
- * 黃錦樹：《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臺北：麥田出版社，2015年。
- 黃錦樹：《注釋南方——馬華文學短論集》，八打靈再也：有人出版社，2015年。
- 黃錦樹：《火笑了》，臺北：麥田出版社，2015年。
- 黃錦樹：《雨》，臺北：寶瓶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6年。
- * 黃錦樹：《論嘗試文》，臺北：麥田出版社，2016年。
- 黃錦樹：〈中文現代主義：理論反思與個案研究〉，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劃成果報告，計劃編號：MOST 104-2410-H-260-042，2017年。
- 黃錦樹：《烏暗暝》，臺北：麥田出版社，2017年。
- 黃錦樹：〈會意：隱喻與轉喻的兩極〉，《中山人文學報》第45期（2018年7月）。
- 黃錦樹：《民國的慢船》，八打靈再也：有人出版社，2019年。
- 黃錦樹：《時差的贈禮》，臺北：麥田出版社，2019年。
- 黃錦樹：〈「馬華身後有一個民國的影子」——試論馬華文學的民國向度〉，《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學刊》第24期（2020年12月）。
- 黃錦樹：〈論「非詩」〉，《中山人文學報》第48期（2020年1月）。

黃錦樹：〈致李唐：人很難超脫自身存在的深井〉，《青年文學》2020 年第 6 期。

黃錦樹：〈尋找故居〉，<https://udn.com/news/story/12661/4737458>。檢索日期：2021 年 5 月 12 日。

黃錦樹：《大象死去的河邊》，臺北：麥田出版社，2021 年。

黃錦樹：〈故鄉的野草〉，《聯合報》D3 版，2021 年 4 月 1 日。

魯迅：《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

（美）羅鵬（Carlos Rojas）：〈南下：東南亞家園與離散敘事〉，《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19 年第 2 期。

*（美）羅鵬（Carlos Rojas）：〈傳統與離散：從魯迅到黃錦樹〉，《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9 卷第 2 期（2019 年 7 月）。DOI:10.6123/JCRP.201907-9(2).0005

（美）Rojas, Carlos. (2021) “A Surplus of Fish: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Ecologies in Ng Kim Chew’s Fiction,”（魚之餘：黃錦樹小說中的語言、文學和文化生態）*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aiwan Studies*, 4, pp. 121-141. DOI:10.1163/24688800-20201150

（說明：書目前標示 * 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Chan, Y.-S., Teoh, K.-T., & Lim, C.-B. (Eds.). (2002). *Lawei Mahua wenxue: Jiuling niandai Mahua wenxue zhenglunxing keti wenxuan* [Spicy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A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the controversial issues of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in the 1990s]. Kuala Lumpur: Selangor Chinese Assembly Hall and FAATUM.

Chong, K.-W. (2022). Hui zhandou de Nanyang yecao: Lun Yunlifeng de Yecao fangzuo [A fighting Nanyang grass: On Yunlifeng’s imitation of *Wild Grass*]. *Chinese Studies*, 40(1), 267-299.

-
- Ng, K.-C. (2003). *Huangyan huo zhenli de jiyi: Dangdai zhongwen xiaoshuo lunji* [The craft of falsehood or the craft of truth: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criticism]. Taipei: Rye Field.
- Ng, K.-C. (2012). *Mahua wenxue yu zhongguoxing (Zengding ban)*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and Chineseness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Taipei: Rye Field.
- Ng, K.-C. (2015). *Yu* [Fish]. New Taipei: Ink.
- Ng, K.-C. (2015). *Huawen xiaowenxue de Malaixiya ge'an* [The case of Malaysia in minor Sinophone literature]. Taipei: Rye Field.
- Ng, K.-C. (2016). *Lun changshiwen* [On essaying]. Taipei: Rye Field.
- Ng, K.-H. (1995). Yixiang de neizai liulizhe: Fangwen Huang Jinshu xuezhang [Internally displaced people in a strange land: Interview with my senior, Ng Kim Chew]. *Youth of Malaysia*, 10, 2-9.
- Rojas, C. (2019). Chuantong yu lisan: Cong Lu Xun dao Huang Jinshu [Tradition and diaspora: From Lu Xun to Ng Kim Chew].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9(2), 105-120.
- Tee, K.-T. (Ed.). (2019). *Lisan, bentu yu mahua wenxue lunshu* [Diaspora, localis, and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Kaohsiung: Center for the Humanitie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臺大中文學報

(第七十七期抽印本)

「詩性魯迅」與「政治魯迅」之間： 論黃錦樹的「南洋魯迅」重構

張 康 文 著

臺灣 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印行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六月出版